

第一章 从米特·阿布·库姆 到外国人监狱

—

蜂蜜来了。有人在街巷里和村子的空场上吆喝着。我奶奶急忙奔去。我拉着她的手，跟着她朝小河边跑；驶向我们邻村祖尔卡村的蜂蜜船就停泊在那儿。

路不远。但我们每走一步，我的心中都充满着欢乐和自豪，因为一路上，男人们都站着向我奶奶致意。尽管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但我看见不少的人都去找她，求她排解疑难，祛除疾病，因为在我们的村或邻近的村庄里没有一个人能象她那样熟知古老的阿拉伯药方和草药。

我们买了一罐黑色蜂蜜，便回家了。我跟在奶奶后面走着；当时我是一个身材瘦小、光着一双脚、穿着一件长衫、里面衬着一件白洋布做的白色背心的棕色少年。我两眼直盯着蜂蜜罐。那是我们终于能够觅到的宝贝。

当我们将它同酸奶搅拌在一起时，味道是多么可口呀！

我多么幸福，就象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使我幸福似的。

的确，村庄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幸福的源泉，再无其它幸福可以比拟：

当我们出门买胡萝卜时，我们不到胡萝卜小贩那里去买，而是直接到地里去买。

我把一头洋葱埋在面包烤炉下面的热灰里，到晚上回来时，再

把它掏出来吃。

在月色皎洁的夜晚，我常常同村里的伙伴们一起玩耍或坐在石凳上聊天，这时，我们和周围的大自然以及头顶上的天穹融成了一体。

太阳升起来了。农民们走出家门，到那一望无际的绿野和广阔、平整的土地上去劳动。我同数十名幼童、少年和男人们走在一起，牲畜也同我一起加入了这些农民的队伍。

掩映在尼罗河三角洲怀抱里的我的安谧的村庄米特·阿布·库姆的一切，甚至于冬天的水的寒冷都使我感到幸福。黎明，我走出家门，小河浜里的水满了，但存水一次不超过 15 天 或不超过我们村灌溉用的水量。因此，迅速工作和参加这一工作就成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我们每天都要浇灌一块地，至于我们用谁的水车，浇灌谁的土地，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期限一结束，全村的土地是否都已浇过了。

这种同别人和为着别人的集体劳动并不是因为我指望有什么收益或好处，它使我感到我既不是属于我们全家的小家庭，也是不属于我们村子这样一个大家庭，而是属于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它就是土地。

在夕阳西下的归途中，家家户户炊烟缕缕。这是可口的晚饭的信号。晚饭后，村子里的一天结束了，平静笼罩着每一个人。我们的心中充满安宁。我凝视着树木和禾苗，感到有一条爱和友谊的无形的纽带将我同周围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了。

这繁茂的树木是真主创造的。他要它存在，就存在了。这郁郁葱葱的庄稼的种子是由我们用双手播下的。但要是没有真主的意志，它就不会存在。我们漫步的这一块土地，这条水势涣涣的小河，我周围的一切，都是伟大的真主创造的。他关怀它，照料它；对我也是这样。

那么，树木、种子和果实就都是我在这个天地中的伙伴了。难道我们大家不是生于大地；没有它，我们就不存在吗？

大地是坚强有力的，属于它的一切东西必须象它那样。当我回忆起我奶奶的话时，这些念头便浮现在我幼小的脑海里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同你是大地的儿子这一事实相媲美。大地是永存的，因为真主将他所有的秘密都寄托给它了。”

我多么喜欢这位老太太呀！除了智慧、天资、经验和生活以外，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我在乡村里成长期间，她是一家之长。因为我的父亲同军队一起在苏丹工作。她抚育我们。她象任何一个男人一样，跟着人们出去，经营我父亲占有的两点五费丹土地。^①

“先生之母”，在村里人们这样称呼她。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在我们这里，进入爱资哈尔^②是乡下人最大的希望。但我那识文断字的爷爷——在他那个时候是很少的——想为我的父亲开辟另外一条道路，于是把他送进了洋学堂，从而获得了小学证书。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资历。因为埃及在被英国占领的初期，所有的教材都用英文讲授。

我父亲是我们村第一个获得小学证书的人。因此，尽管现在我们村有了工程师、医生和大学教授，但当提起先生和先生的孩子们时，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我的父亲和他的孩子们。

看来我奶奶想要我走我父亲走过的道路。她将我送进了村里的私塾。在那里我学会了读书写字，会背古兰经。而后她又将我转到在图赫的科卜特（Coptic）学校。在图赫有一所著名的古老的修道院，它的大主教就是尼特伦洼地修道院的大主教。

费丹：埃及面积单位，等于 42 公亩。——译注

^② 爱资哈尔：埃及最古老、最大的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大学，称为艾资哈尔大学，有几个学院。但它的教学和研究活动都是从伊斯兰教观念出发的。——译注

学校距我们村不过一公里多。尽管我在校时间不长，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教我们的米纳先生。他担任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怕他，同时又喜欢他。那座大钟至今仍在我的耳际铿锵作响。这钟声宣布一天学习的开始，同时也激动着我的心：对于知识我又恐惧又尊重。

那个私塾，我至今仍然能想象出它来，就好象我昨天才离开它似的。对于不久前去世的良师谢赫阿卜杜·哈密德，我非常推崇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为我打开知识和信仰大门的人。

我与我私塾的同窗席地而坐，我拿着一块石板，一支石笔。我的一切用具都是用于求知的。早晨我在我的宽大的长衫口袋里装上粘有面包屑的干奶酪，上课或课间时我便一口一口地吞吃。

我对知识的兴趣与日俱增，但它从来没有使我忘记自己的村庄。

我在村子里的生活充满着欢乐。因为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耕种季节，灌溉季节，小麦丰收季节丰收季节的庆典，村庄的欢乐和我们狼吞虎咽般地爱吃的甜粉丝糖果，一向伴随椰枣到来的棉花丰收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 我用手捧起棉花 夹在腋下 而后急忙跑到女椰枣贩那里，将棉花交给她，她给我相应的椰枣。

当我赶着牲口去小河边饮水，或坐在牲口拉的打谷机上打麦，或同别的少年一起拾棉花时，我每一次都感到我是第一次做这些事。因为我在村庄里的生活总是不断地有所发现，它宛如大海周围的小溪，里边的水总是新鲜的。

这种对于我所做的或看见的任何事情都是新鲜的感觉，我在村庄里整个成长时期，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它是我幸福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甚至每天夜里有时是我母亲、有时是我奶奶给我讲的那些故事，我每次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好象每次都是新的，我从来没有听

到过似的，虽然这些故事都是些老生常谈了。

这些故事不是关于沙推尔的传说^①或阿布·宰耶德·海拉里的英雄业迹^②。它比那些古代的神话同我们更接近、同我们的生活更密切相关。

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英国人如何用阴谋诡计毒杀了穆斯塔法·卡迈勒^③，致使他不能继续反抗他们。当时我不知道穆斯塔法·卡迈勒是何人，也不知道他在青年时代就死去了。但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一个叫做英吉利的民族。他们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是坏人，因为他们对人们施放毒药。

我奶奶还给我们讲过艾德海姆·沙拉卡威^④的民谣，他的英雄事迹，他的斗争以及他反抗英国人和当局的智慧。

但在我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是关于淡水洼的英雄扎赫兰的民谣。这是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我伏在温暖的面包炉顶上，我的旁边是兔子和我的弟弟们。他们都入睡了，而我却似睡非睡。

这个民谣我每次听到时都为之入迷。淡水洼是距我们村只有五公里多的一个村庄。这个民谣讲，当英国士兵看到淡水洼的鸽

沙推尔的传说：沙推尔即传说中的沙推尔·哈桑，因此人聪明过人，所以后来人们便把他作为一个英雄人物传颂。——译注

阿布·宰耶德·海拉里是关于海拉里人和他们进行冒险故事里的一个英雄人物。海拉里原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部落，后来离开阿拉伯半岛，到上埃及定居，而后再于九世纪侵入非洲。他们的经历后来就成了海拉里人故事和歌曲的主题，阿布·宰耶德也就成了人所共知的英雄。——译注

^③ 穆斯塔法·卡迈勒：1874—1908，埃及资产阶级激进派，1907年组织民族主义政党——新祖国党，创办“旗帜报”。他宣布他们的运动的目的是：“保卫埃及和埃及人的权利，争取埃及人的独立，制定一部民主的宪法。”——译注

艾德海姆·沙拉卡威：埃及反英斗争的英雄。——译注

淡水洼：又译作丹沙微，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木努菲叶省。淡水洼事件发生在1906年6月。英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坚决反抗，导致了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英帝国主义被迫作了某些让步。淡水洼事件是二十世纪初埃及民族独立运动新高潮的开端。——译注

笼时，向它开了枪。

一颗流弹燃着了一个小麦垛，农民们集合了起来。一个英国士兵向他们开了枪，跑了。农民们跟在后面追，抓住了他。发生了一场搏斗。这个英国士兵在搏斗中死去。他们马上逮捕了村民，在村里成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并在公布判决之前，就吊起了绞刑架。有的农民被判处笞刑，有的被判处绞刑。

扎赫兰是同英国人进行战斗的英雄，他第一个被判处绞刑。这个民谣讲述了扎赫兰在战斗中的勇敢和坚定。他自豪地、昂着头走向绞刑架，因为他抗击了侵略者，杀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

我曾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似睡非睡地——如上面所说的——倾听这个民谣，也许正因为这个原故，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刻上了这个故事。我想入非非：我多少次梦见扎赫兰，在似睡非睡中经历了他的英雄业绩。我多么希望成为扎赫兰啊。

就这样，我从乡村里我们家的面包炉顶上懂得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某种谬误。在我看见英国人之前，在我还在我们的乡村里的时候，我学会了仇视那些杀害和鞭笞我们乡亲的侵略者。

但这并不是我在米特·阿布·库姆所学到的全部东西，因为在那之后，我学到了我终生受用的其它东西，这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在任何地方，我都知道我处身何地。我决不会迷路，因为我知道我生长在哺育了我的乡村土地上的根子是有生命力的、牢固的，正如它哺育的禾苗和树木一样。

就这样，我在我那安谧的村庄里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初岁月。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突然和我们全家搬到了开罗，因为我的父亲——如他们对我所说的——已经从苏丹回来了。

当时我多大了？我不知道。后来我只知道我生活中的事件与历史事件是并行不悖地前进的。

如此等等——似乎……这是命中注定的。

一九二四年英国统帅李·斯塔克^①暗杀事件后，我于一九二五年来到开罗。因为英国对埃及的最重要的惩罚是从苏丹撤回埃及军队，所以我父亲与埃及军队一起回来了。

我们住在库巴大桥的一所小房子里。我应该继续我在图赫学校已经开始了的普通教育。我父亲为我选择了伊斯兰福利协会学校，因为这是一所国民学校，他的收入负担得起这所学校的费用。

我拿着我的证件，真的进了这所学校。那时，从我所持的证件中才知道我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所学校设在宰敦，我每天步行去这所学校，步行着回来。途中我常常经过库巴宫，它是当时福阿德^②国王的一座宫殿。

我仍记得我和一些同学在春天爬在王宫花园的墙上，采摘杏子。我们的胸中起伏着阵阵恐惧的波浪，因为只要接近国王的任何东西，那就意味着我、我的家庭和任何一个人的覆灭。

在那遥远的时刻，我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学们将会参加改变历史面貌的活动，有朝一日我将会越过这恐怖的围墙，坐在福阿德和在他之后的法鲁克^③国王坐过的同一座位上。

我在伊斯兰福利协会学校度过了预备期、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我记得在那一阶段，在学习中我是优秀生。我和前社会保险大臣、已故的哈桑·谢里夫博士轮流获得班上第一名。

二年级后，我转到位于新埃及区边缘的苏尔坦·侯赛因^④学

李·斯塔克是英国委任的驻苏丹的统治者，1924年在开罗被杀。——译注

② 福阿德为埃及从1917年至1936年的国王，生于1868年，卒于1936年。——译注

法鲁克（1920—1965），1936年其父福阿德国王去世，他于1937年继任埃及国王，直至1952年7月23日革命爆发时被推翻。1965年3月去世于罗马。——译注
即前面所说福阿德国王的哥哥，福阿德继承他为埃及国王。——译注

校，在那儿我获得了小学毕业证书。而后，我和我的大哥塔拉特考入了福阿德一世^①高中。

那是在一九三〇年。当时法律规定我们当中有一人可免费入学，而另一人则需自费。但我们的要求被拒绝了。因此，我父亲不得不支付我和我哥哥两个人的费用。第一期费用为十六镑，等于我父亲一个月的全部薪水。他给了我，我交给了学校。当第二期费用交付日期到来时，我哥哥塔拉特从我父亲那里拿了钱，但他没有交给学校，而是携带着这些钱逃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后来他花得一文不剩地回来了，他声称不想继续求学了。

也许这是天命。因为没有我哥哥的辍学，我父亲以其有限的收入怎能支付我们两个人的学习费用呢？当时最大的可能是他将不得不中断我的学习，因为塔拉特是我的哥哥。

在这所高中，我第一次对城里人打开了眼界，我懂得了阶级和差别的含义。因为在这所学校里有国防大臣的儿子和教育副大臣的儿子。他们每个人上学和放学回家都坐着我们乡下人称之为 *comobile* 的豪华的汽车，非常阔气。但它在我的心灵中没有留下任何忌妒和仇恨。当然，我班里的同学们的衣服都比我的衣服好得多，但我并不介意。

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名门子弟。他们住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豪华的房子。但我不记得我曾有过有朝一日要象他们一样的宏愿；绝对没有。因为在家乡，我们有自己的家园和牲畜，大家都知道我是先生的儿子，——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我向往的土地，以及坚
定不拔、持久、完美等等都市里人不懂的乡村的道德观念。

在开罗我们居住的街道上，有一次我到杂货店去买一盒火柴。我说：“我要一盒取灯儿。”^②

即前面所说福阿德国王。——译注

这里说的是“火柴”一词在方言和标准语里的不同说法，比附作“取灯儿”和“火柴”。——译注。

顾客们突然哄堂大笑。我莫名其妙！他们对我说：“你应该说火柴。”我坚持说是“取灯儿。”他们继续嘲笑我。面对这种嘲笑，我感到我比他们更有力量，他们有什么资格嘲笑我？

在他们看来，比他们优越的人是那些比他们钱多，比他们门第高贵的人。而我们乡村里的人，则对这些事情毫不在乎。在我们看来有道德的人本身就是最高典范，尽管他可能一贫如洗。在我们乡村有一种东西叫缺点。我们彼此以兄弟相称，合作相助和友爱相处。至于城里人，他们则看重他们的金钱，权势和豪华的宅第。所有这些都是分文不值的、昙花一现的东西。

就这样，在乡村里哺育我成长的、在城市里我从未发现有与之相类似的全部道德观念是我早期生活的支柱。我深深感到我内在的优越；这种内在的优越自我出生以来，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它实际上还是——我越来越懂得这一点——一种内在力量；它不依靠任何外界的物质，恰恰相反，正是外界物质依靠着它。当外部物质来源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的时候，这种内在的优越感也许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在高中阶段，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为我父亲靠他的有限收入要养活十二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家庭。因此，尽管我们生活在开罗，我们家里却有一个烤面包的炉子。因为象城里人一样从市场上买面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办不到的事情。

我一天的零用钱是二分钱。我用这点微不足道的钱买一杯牛奶茶。我喝着，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与此同时，我看到我周围的同学从学校的小卖部购买各种最高级的巧克力和糖果。他们当中一个人有好几套讲究的衣服，供他们随意挑选，因而他们总是穿着入时衣冠楚楚。而我只有一套穿了多年的衣服，但是，我无法替换或添置新的衣服。

现在每当我回忆这些往事时，我不记得它曾使我感到自己比

同学少了什么东西。在那些岁月里，它压根儿就没能引诱我去同他们比高低。

我只记得当我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时，我们必须在登记表上贴上一张本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在任何一个学生眼里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高中毕业证书理所当然地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我去找父亲，向他要一套新衣服，用它来拍摄这一历史性的照片。我父亲懂得我这一要求的重要性，但他说：“你宽限我一两天，让我筹划这笔钱。”第三天，他面带笑容地来了，说：“我有办法了，你到白勒哈商店去吧。那儿有很多店铺，都很相象。但这个名字就是那个商店老板的名字。你就到那里去吧。”他给了我一百五十个吉尔什。^①

这家商店的大小不过 1.5×2 平方米。在商店的正面摆着一张与铺面几乎一样长的桌子。在桌子的后面站着老板。老板的后面摆着几个架子，上面放着一些布匹。在角落里放着一台缝纫机。我选好了布料。一个男人从我手中接了过去，进行裁剪，然后坐到他的缝纫机旁。一个半小时后，他就将我的新衣服交给了我。

当然，我的服装与我的同学们为这一时刻准备的服装不能相比，但我为此感到非常幸福。因为它使我得偿所愿，即使手工粗糙或外观寒酸也无关紧要。再说，有它没它，我还是我；一个小乡巴佬；他在务农生活中看到了把他和其他务农的人同依靠商业为生的城里人区别开来的不同特点。

就这样，在开罗求学的整个期间，我的生活处处都表现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比或差异。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它从来也没有丝毫城市化。正相反，在开罗有很多事情使我很烦恼。

骑着摩托车的英国警察的情景就是一例，他象发了疯似地昼夜不停地在大街上巡视；蕃茄色的脸孔，粗暴而又愚蠢；双眼突出，

^① 埃及的货币名称，相当于我国货币的角。——译注

嘴象白痴的嘴一样总是咧着；脑门上满是疙瘩，头上戴一顶盖到耳朵的深红色的高高的土耳其帽。

人们都害怕他。至于我，我讨厌看见他。我问自己：是什么东西把这一丑陋的异国人带到这个城市的？

假如他来到我们乡村的话，他就会寸步难行。但他没有来，也决不会来，因为他不敢来。

我每次碰到压路机，都见它跟在我后面。我快走，它也快走。我跑，它也在我后面跟着跑。它究竟要干什么呢？很显然它想将我压死在它那巨大的铁滚子下面。但我不认识它，它也不认识我，它要干什么呢？这些问题对我无济于事，因为我每次往后面看时，都见它跟着我，我就愈加恐惧。直到我转弯到它难以通行的狭窄的胡同里，或者我拔腿飞跑，彼此都见不到时，我才得救。因为很明显 尽管它实力强大 我柔弱渺小 但我比它快得多。

我一生中第一次进电影院时，那是很紧张的一天。因为我看见从银幕的远处开来一列火车，朝我飞速冲来。我怎么办？我闭上了双眼，身体向后靠。但火车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轰鸣。还等什么？我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迅速穿过成排的座位逃跑。我看了看周围的人，他们都坐在座位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这是他们的事，我心里说。但我刚走到最后一排时——我的两只眼睛一直盯在银幕上——就找不到这列火车了，看到的是一男一女，正在一个小咖啡馆里进餐。于是，我又穿过一排排的座位，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我平静地注视着电影中的故事，就象别人一样。

那天我所看到的事情实在使我眼花缭乱，结果我又买了那天下午三点至六点的第二场电影票。我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再次观看这奇怪的火车。

当时我已从高中二年级升入三年级。但由于总分低，他们要

我留在二年级，以此来维护学校资格证书的总成绩。这种证书是在三年级后我们将要得到的总证书。我拒绝了，我从福阿德一世学校撤回了我的证件，交给了一所私立学校——金字塔学校。他们接受我升入三年级。同一年我获得了资格证书。

出于不愿甘休的意念——我在年轻时期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想法——我又一次拿着我的证件来到福阿德一世学校，我考入了四年级。但在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也就是高中学习的最后阶段的考试中，我又重演了从二年级升入三年级时的事情。我又从福阿德一世学校取回了我的证件，来到金字塔学校。他们接受我升入五年级。在这年结束时，我想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所有各科我都及格，但我在总分中落了第。

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知道我的落第足以证明真主对我不满意，至高无上的真主给了我惩罚，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我的任性，也许是由于过于自信。我只能象以往一样，求助于我心中的乡村的道德观念。带着对犯罪和忏悔的蒙眬的感觉，我将我的证件转到了在沙巴拉的利卡·玛阿利夫学校，从而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

三

人们也许以为我所说的忏悔的感觉是指我在学习期间曾离弃过——哪怕是很短的时间——乡村。但这是绝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只要学习一结束，我就回到我的村庄去。我躺在她的怀抱里；这是我的理想社会。我曾在这里发现了自我，甚至发现了整个祖国。因为很长一个时期，在我看来埃及就是米特·阿布·库姆。至于对祖国的完整概念，只是在高中阶段结束后，我才懂得它 感受到它。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在米特·阿布·库姆我们家里的面包炉

顶上一夜又一夜地倾听扎赫兰的民谣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到我正在失去一种东西，感到有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

扎赫兰在我的意识中与穆斯塔法·卡迈勒和艾德海姆·什拉卡威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是一个人，或者说，他们在抗击那些绞死和鞭笞我们邻村淡水洼村民们的野蛮的侵略者英国人的斗争中，就是这样展现在我面前的。但当我来到开罗时，在我们家里我看到了基马尔·阿塔丘尔克的照片。我问父亲他是谁。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当时阿塔丘尔克在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最高的典范，他的名字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因为他为解放和重建自己的国家进行了斗争。我父亲对他非常钦佩，就象他钦佩拿破仑一样。他同我谈论了很长时间关于他所记得的拿破仑的故事。当英国人将他流放到圣赫勒纳岛时，这个岛上的英国统治者故意将拿破仑屋子的门搞得很矮，以迫使这位被俘的法国司令每次进出时不得不躬下身来。但拿破仑没有使他达到目的，因为他趴在地上，匍匐着进出屋子，但他高昂着头。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但它却反映了埃及人民意识中的英雄形象，因为这位英雄是英国人最强大的一个对手。当时我们的国家遭到英国人的占领，我们正以我们手中的一切手段来把他们从我们之中赶出去。

在这里，我钦佩萨德·扎格鲁勒^②。每天晚上我都到哈里发·马蒙大街^③去，等候他的继任者努哈斯·帕夏^④——他从在新埃及

基马尔，一译凯末尔·阿塔图克，即穆斯塔法·基马尔，二十世纪初年土耳其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阿塔丘尔克是后来赠给他的姓，意为土耳其之父。——译注

^② 萨德·扎格鲁勒(1860—1926)，埃及的政治领袖，是为埃及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战士。——译注

^③ 哈里发·马蒙(786—833年)，阿巴斯王朝的一个哈里发。——译注

^④ 努哈斯·帕夏(1876—1960)，埃及的一位政治领袖，为埃及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曾加入华夫特党。在萨德·扎格鲁勒逝世后，他继任该党的领袖。——译注

的家中到民族之家去和他回家时都要经过这里。因为当时我认为努哈斯和华夫特党^①是全体埃及人民反对英国人的一个象征。

我不能说我的政治觉悟在我一生中的这样早的时候已经成熟或已经形成了。但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与每个埃及人心中激荡着的民族感是一致的，因而我参加游行，打碎盘子，烧毁汽车和高呼打倒西德基帕夏，恢复一九二三年宪法；其实我并不懂得这个宪法是什么。

但我可以这样说，直到我离开这所高中时，我有一种对侵略者的仇恨，对所有努力解放自己国家的人的热爱和钦佩，这种潜在的感情已在我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甘地取道埃及去英国时，埃及的报刊刊登了他大量的消息、他的生平和斗争。因而我以他为榜样，他的形象攫住了我的心，我一心一意想效仿他。我脱下我的衣服，将下半截身子用一块布遮上。我做了一个斗篷，在开罗我们家的屋顶上静坐了几天，最后我父亲说服我放弃了这一行为。我做的事对我或埃及毫无益处，而且相反，我肯定要得胸科病，因为当时是严寒的冬天。

当希特勒从慕尼黑向柏林前进，将他的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后果中拯救出来、重建国家时，我正在村庄里度夏。

我召集了我的同学。我对他们说我们应该象希特勒那样行动。我打算从米特·阿布·库姆向开罗前进。当时我才十二岁。他们奚落我，离开了我。

这些事实中的大多数为一条我尚不明确的斗争路线自发地奠定着基础，但在这些基础——实际上是一些冲动和反应加上某些行动的总和——中我还有一件东西，就是我对基马尔·阿塔丘尔

华夫特党，一译华夫脱党，是由其领袖萨德·扎格鲁勒于1918年建立的一个政党，其宗旨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1921年赴伦敦与英政府谈判，要求国家独立。该党曾几度组阁，于1953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被取缔。——译注

克的热爱。阿塔丘尔克的军装特别使我神往。没有武装部队，他就一事无成，就不能实现他的革命。

如我曾经说过的，我生活中的事件是与历史事件并行不悖的。一九三六年我结束了高中学业，同年，努哈斯·帕夏与英国签署了一九三六年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埃及军队被允许扩充，这样我就有可能考入军事学院。在那之前，埃及军队规模小，效能差，只有上层的子弟才能进军事学院。

但尽管实现我进入军事学院的愿望有了新的方便条件，我还是未能轻而易举地考入这个学院；而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诚然，他们允许中产和贫穷阶层的子弟进这所学院，但入校申请书上有两个条件：父亲的收入和他的财产，其次是中保人。在登记表上，他们正式称我们为某某人之子某某，由某某为其中保人。

对于第一个条件，我父亲是政府的一个职员，因而至少他有固定的收入。至于中保人，我到哪里去找呢？如我曾说过的，我父亲只是医务科的一个书写员，达官富豪他一个都不认识。

人们对他说招生委员会主席是易卜拉欣·帕夏·海里少将，应该去找他。但怎么去呢？

易卜拉欣·帕夏当时是贵族中的佼佼者，因为福阿德国王委托他教育风流潇洒的法鲁克，因此他是国王的教师，此外，他还兼国防副大臣。其次，他是王室中某位女士的丈夫。简言之，易卜拉欣·帕夏是这个社会的一颗明星。我们这些连大臣的秘书都找不到的人，到哪里去找他呢？

最后，我那以其纯朴闻名的父亲终于找到了办法：在苏丹服役时，他认识一个准尉。

凑巧，这位准尉在为易卜拉欣·帕夏服务。他为我和我的父亲安排了——我不知道是如何安排的——见到易卜拉欣·帕夏的机会。一天早晨，我和父亲来到了座落在当时开罗的一个贵族区

库巴花园中的帕夏家中。

我们走进风雅别致的别墅，站在走廊上。这种安排使得帕夏出门时，一定要经过我们。我们就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就会问我们想干什么。果然，不一会儿，帕夏出来了。

准尉向他走过去，同他耳语了一番。而后易卜拉欣·帕夏瞥了我和我父亲一眼，非常高傲地对我父亲说：

“啊……啊……你是医务科的书写员，这是你的儿子。好……好……”他很快就向大门口走去。我父亲跟在他后面，嘟嘟囔囔说些我不明白的话。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了些啥。

这是一次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经历，我想我终身不会忘记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帕夏的家或会见这个阶层中的人。几年后，我偶然地又遇到了易卜拉欣·帕夏，那时我是国民议会主席。我是在我的办公室里接见他时见到他的。他有一些关于他的子女以及警卫等问题。我帮助他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向他提起我们在他家的第一次会晤。但我对他说：

“你毋需想象这次会晤在我的心灵中对你留下了什么印象。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在任何时候都准备成全你的一切要求，因为我对你非常感谢。这不是由于我们在库巴花园你家中的会见，而是因为你当时是招生委员会主席，你将我、并且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所有军官都招进了军事学院。假如没有你，革命就不会发生……”

矛盾和差谬无穷无尽。但最明显不过的也许是：我入军事学院的目标是要将国家从英国人手里拯救出来，而就是这些英国人帮助我进了这所学院。

我们在易卜拉欣·帕夏·海里家中见到他之后，按照入学申请书上的规定，如同我在前面所说的，我还必须找中保人。我父亲只好找了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埃及军队的主任医师。他是一个英国

人，名叫费特斯·巴特里克。他答应了这个要求，写了引荐信，并将我推荐给学院的一位主任教师。他是招生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一样，也是一个英国人。

就这样，我被安排为最后一名录取生，进入了军事学院。一共录取了五十二名。我列为最后一名是因为我的中保人地位最低。当时的中保人上至王储穆罕默德·阿里亲王，下至有势力的达官显贵。

但我在录取后去交费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国防大臣哈姆迪·赛义夫·纳斯尔·帕夏与努哈斯·帕夏在蒙特利亚签署了取消外国特权的条约；这一特权曾使外国人在埃及享有治外法权。（根据那些特权，外国人在埃及犯了罪，埃及政府不能判罪或逮捕，只有他的使馆才能进行审判或予以豁免，这是一种奇特和令人厌恶的事情。）我现在言归正传。当他们致函在蒙特利亚的国防大臣，按照法律要求他批准军事学院录取我们时，他发出一封电报，要求为他的亲属保留六个名额。学院当局只好将最后六个人除名。我当然是被除名者当中的头一个。

而后麻烦很多。我考取了文学院，后来又考取了法律学院、商业学院。在哈姆迪·赛义夫·纳斯尔回来以后，将他的亲属送进了军事学院。后来，军队的主任医师和英国主任教师进行了干预，在我完全失望之后，有一天，我母亲突然要我立即到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去，到他那里去拿军事学院的费用，因为我被军事学院录取了。我们这批同学入学已经晚了整整二十六天。

在军事学院，阿塔丘尔克仍然是我最崇高的榜样。因而我开始阅读关于土耳其革命的书籍，我还复习了埃及历史，但只复习到拿破仑的远征^①。因为当时我的主要精力在于研究一八八二年的英国占领、英国人进入埃及的诡计以及由此造成的我们遭受的

^① 拿破仑远征埃及在 1799 年 5 月。——译注